

# 我的讀書生活

李國鼎

## ——慶祝中央大學建校六十週年的回憶

### 四易校名四朝元老

六十四年六月九日是母校國立中央大學六十週年，我們同學曾在台灣桃園中壢集會慶祝。對我說起來，回憶不是在我入大學開始，而是在入母校的附屬小學開始。

民國九年一月，我開始脫離私塾的生活，背了書包進入了大石橋的南京高等師範與暨南大學合辦的附屬小學的高一班。當時的校長是郭秉文先生，小學主任是龔子夷先生，因為小學和高等師範是聯在一起，所以我和母校的關係是在小學已開始。那時候最起勁的事是在華東八大學的足球比



民國二十五年本文作者就讀於英國劍橋大學三一書院時攝。

賽，一定是每場必到，自動擔任啦啦隊。因為母校還是南京高等師範，所以小學猶如實驗小學，凡是新的教學方法都在小學作實驗，然後推行到其他學校，我們學校籌建了杜威堂，就因為美國大教育家杜威來華，我們學校介紹他的教學方法而建造的。小學畢業在民國十一年，因為小病未來得及投考附中，後來考入鍾英中學，所以我對母校的回憶是從我進小學開始，於今已經五十五年了。

民國十五年在鍾英中學畢業後考入國立東南大學（蔣維喬先生任校長）終於得償夙願，當時由舊制中學畢業，先進預料已決定進入理

學院。不及一年國民革命軍攻入南京，學校停了一學期功課，改名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由張乃燕先生任校長。我先主修數學輔修物理，一年以後改為主修物理輔修數學。因為學分制，我讀的很快，先後四整年，十九年冬季畢業。這一個時候在中華民國歷史上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國民革命



本文作者（右二）任經濟部長時陪同嚴副總統（右三）視察中油崎頂二號油氣井留影。

軍北伐成功統一中國，積極準備建國的時期。

和同學談起來，我們一班常自己以四朝元老自居，因為十五年考入東南大學，十六年改稱第四中山大學兼管江蘇省教育行政，十八年教育部取消大學區制，改為國立江蘇大學，學校師生羣情激憤，於是把校名牌子送還給教育部，終於在十九年決定改稱為國立中央大學，等到畢業文憑拿到手已經是中央大學了，短短的四年期間，校名更易四次，我竟能恭逢盛會。

母校各科各系皆有平衡的發展，但是理學院基礎的奠立，早在東南大學時代郭秉文先生時，他赴美網羅很多科學人才——當時還沒有所謂「青年才俊」的名稱——回國教書和主持研究。南高時代的理科教室不幸遭受回祿，洛氏基金會立刻補助建立了嶄新的理學院，設備完善，所以母校理學院的畢業生留學返國，多被北方的各大學挖角走了。

理學院研究和讀書風氣很濃厚，教授講師和助教都是以學校為家的，所以師生感情很好，學生在這樣良好的讀書環境下自然努力的孜孜不輟了。

### 客觀深思永難或忘

我們除了上課和實驗外，課外的活動也很多，在本系就有物理學會，常常請經過南京的有名教授講演，編印手冊。此外除掉中國科學社以外，由中大同學發起了「中華自然科學社」，為年輕學科學的人共同研究。物色會員的方式是上一班打聽下一班的優秀同學，徵求他們參加，因為年輕的人感覺中國科學社許多的成名的老師輩科學家已經「仰之彌高」，會社活動且有形式化的趨勢，所以組織年輕科學家，使學術團體的活力能够生生不息，後來分佈到全國各大學，到勝利以後，活動頗為積極，所出版的「科學世界」頗受歡迎，本人也擔任了兩三年的編輯工作。

我一生感覺抱歉，對不起母校物理系的，便是在民國三十一年在重慶的時候，顧孟餘校長請我擔任物理系主任，我因為那時的志願希望參加與戰時直接有關的生產工作，所以在兩項工作之間選擇了資渝鋼鐵廠，那是一個小型鋼鐵廠，因為後方需要鋼鐵甚殷，所以由我國派赴法國實習準備返國後籌建中央鋼鐵廠的一般優秀工程師負責籌建，我終於選擇了這一項工作，而不得不對母校的邀請婉却了。對母校來說，我始終感覺歉意，但是我這一個選擇無形中對我以後的工作決定了方向——參加國家工業化的工作。

在鋼鐵廠三年，然後轉到戰時生產局，並協調資源委員會各鋼鐵廠的生產工作，勝利後派赴京滬協助籌建中央造船廠，三十七年奉派來台參加台灣造船公司，四十二年參加工業委員會負責四年計劃工業部門的設計和推動新興工業。四十七年轉任美援會，仍兼經濟部工礦計劃連繫組召集人和工業發展投資小組召集人等職，無不與工業化工作有關。

從一個學物理的人轉向工業，轉向經濟設計。必需無時不在學習求新知，所涉及範圍由純粹科學而工程，而技術，而經濟，因為學科學所奠定的基礎和分析的能力對於吸收新知，常識判斷極有幫助。

五十四年奉命擔任經濟部部長，五十八年轉任財政部部長，其所牽涉的範圍由自然和工程科學推及社會及人文科學，所幸一方面承上級主管的領導，同僚的合作，各方面的愛護和指導，無時不是以小心翼翼的心情一面研究學習，一面從事工作，一個學科學的人一定要客觀和深思，離開母校中大已近四十五年，如果對國家和人民有微末的服務的話，母校教育之恩，是永遠不能忘記的！